

#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特点及当代价值探析

游 博

(东南大学 军事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冷战结束前随着中日两国在各个领域彼此交往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特点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突出的务实性、相互的平等性、长远的前瞻性。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中日关系;外交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12-0018-04

DOI:10.13660/j.cnki.42-1112/c.013864

自 2012 年 9 月发生所谓日本“购岛”闹剧以来,中日两国关系再次降到历史的冰点。日本为了实际控制钓鱼岛,近期真可谓动作频频。加强与美国军事同盟,配合美国部署亚太反导系统,将防卫中心转移到西南方向,一系列新式武器装备密集亮相世人,计划筹建水陆两栖部队,加强离岛夺还能力,日美联合“黎明闪电”军事演习以及日本独自进行的“夺岛”演习纷纷上演。持续的中日两国紧张局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此刻,我们缅怀为促进中日友好付出巨大心血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历史见证人的邓小平,挖掘他的对日外交思想,对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政策主张。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sup>[1](p1436)</sup>邓小

平坚持这一政策主张,并成功运用到处理中日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中。

首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在涉及两国历史问题、领土主权完整等大是大非问题上,邓小平主张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含糊,确保中日关系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一是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予以揭露,多次谈到日本要正确面对历史,1986 年 8 月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时指出,“最近有些麻烦,如参拜靖国神社,还有其他的事情。这些问题同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相比,要更本质得多,更实际得多,更重要得多”。“正确对待历史也是对日本人民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sup>[2](p1128-1129)</sup>他向世人清楚表明日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是发展中日关系前提基础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二是反对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1982 年 11 月邓小平在会见宇都宫德马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代表团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的问题时说,“复活军国主义在日本

**作者简介:**游博(1970—),男,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5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中国应对之策”(2242015S20020)的阶段成果。

恐怕更大的问题是教育后代问题,是通过教育把后代引往哪个方向的问题。教科书问题实际上有军国主义的影子在作怪。日本确实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sup>[3](p867)</sup>表达了他对日本擅自修改历史教科书鲜明的态度。三是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邓小平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中国,坚持原则,只不过问题是同日本有争议,但并不改变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他说,“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sup>[4](p87)</sup>四是反对日本抛弃专守防卫。战后日本受《和平宪法》制约,坚持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二战胜利果实所必须的。然而,伴随日本经济实力增长,大国意识也在滋长。中曾根提出政治总决算,摆脱战后体制,“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sup>[5](p677)</sup>中曾根宣称,“日本一旦有事,自卫队有权在周围数百海里和交通线1000海里的范围内保护‘支援日本的’或‘攻击苏联的美国军舰’”。<sup>[6](p679)</sup>“这不但超出《日美安全条约》规定的适用范围——‘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也突破了日本政府宣布的‘不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原则。”<sup>[6](p680)</sup>对于日本要求行使自卫权,扩大防御计划问题,邓小平告诫日本政府,“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拥有自卫力量,但应该有个限度。日本应该知道的历史。它现在已经是经济大国,还进一步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军事大国的含义是什么?日本想在一千海里内承担军事义务,这个性质就变了。如果形成政策,不但中国人民,整个东南亚人民都会提出问题的”。<sup>[7](p932)</sup>五是反对干涉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在台湾地位归属问题上向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日本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屡屡制造破坏“一个中国”的事情发生,光华寮事件就是明证。根据国际法,由于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旧中国在日本财产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承。1986年2月日本京都地方法院却将光华寮错误地判为台湾当局所有。邓小平对日本一直或明或暗搞“两个中国”,不想放弃台湾的图谋保持着高度警惕,有着清醒认识。1987年9月他在会见冢本三郎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就光华寮问题时指出,“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得远

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在‘光华寮’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大一致。你们看作是法律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问题,分歧就在这里”。“而‘光华寮’问题,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的问题”。<sup>[8](p1207)</sup>

其次,在坚持原则坚定性的同时,不失策略的灵活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当日本政府表示不再修改历史教科书,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时,中国政府做到适可而止,不让两国历史问题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愿意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开展经贸人员往来。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并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展现出极大的策略的灵活性。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上同样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出于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考虑,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时,就钓鱼岛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办法。很长一段时期,中日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就这个“君子协定”达成默契,从而确保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 二、突出的务实性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将日本当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而广大日本人民却是战争的受害者,从而为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后,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一对日外交思想,认为新时期破坏中日友好的军国主义分子/极右翼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日本人民是赞成中日友好的,多次在不同场合揭露批判日本极右翼搞军国主义,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展现出发展中日关系时的务实性。1987年5月他在会见宇都宫德马时指出,“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sup>[9](p1185)</sup>同年6月他在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指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台湾,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

很不幸的事情。我们对此始终是担心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sup>[10](p1193)</sup>针对一位日本议员提出日本不存在极右势力的观点,他指出,“存在着极右势力,任何社会都存在。周总理诗碑对日本有什么坏影响,为什么要破坏?”“从三岛由纪夫那件事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sup>[11](p1228)</sup>

### 三、相互的平等性

发展中日关系,不能一味要求一方作出努力,或者限制一方行为。在某些问题领域,要坚持对等性,双方都要作出努力,这对于中日关系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比如邓小平坚持中日两国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这既是中日双方努力的方向,也是对双方各自行为的约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旗帜。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他将反对霸权主义政策贯彻落实到中日关系中,认为中日两国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这对双方都是约束,中日关系才能获得健康长远发展。1977年10月他在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时指出,“现在越来越看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入反霸条款的必要性。这是鉴别我们的政治家是不是有长远的战略观点、中日必须友好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一个试金石”。<sup>[12](p221)</sup>在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下,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中,第二条明确提出,缔约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条约明确写上反霸条款,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也是对中日双方行为的自我约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邓小平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时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sup>[13](p355)</sup>“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且对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sup>[14](p367)</sup>“现在我们称霸,没有资格,这么穷。问题在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称不称霸?到那个时候也不允许称霸。”<sup>[15](p368)</sup>

### 四、长远的前瞻性

中日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两国之间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邓小平认为,局部利益要服从全

局利益,要从长远的、全局的高度看待中日关系,中日两国要世代友好下去。邓小平从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1989年宣布正式退休的这段时期,接待了大量日本政党代表团、日中经济协会、日中友协代表团以及首相议员个人等,并且他特意选择以会见斋藤英四郎为团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作为他正式退休前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邓小平还在许多场合选择同日本各界访华代表团谈话时阐述中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同大平正芳首相谈到中国现代化蓝图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提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即和平与发展等等。这里包含他寄望中日友好的深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sup>[16](p349)</sup>他总是讲中日近两千年友好交往,只有一百多年的路程走得不好,因而对中日友好充满了期待。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情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sup>[17](p968)</sup>

### 五、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以上对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特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要维持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要有正确的态度,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否则,中日关系就会出现困难局面。坚持三个原则,务实性原则、平等性和战略性原则。一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原则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成为一个整体构成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只有正确坚持一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原则,才能确保中日关系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下去,这对指导当下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时,应该继续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确保中日关系健康平稳发展。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不改一贯做法,依然在历史问题上继续挑战中国。小泉首相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教科书;围绕钓鱼岛,2010年发生撞船扣留中国船长事件,2012年发生“购岛”闹剧,打破钓鱼岛现状;力图修改《和平宪法》,抛弃专守防卫,从1992年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派到波斯湾排雷到如今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专守防卫早就抛之脑后。近20多年来,日本一直制造“一中

一台”阻挠中国统一。2005年美日2+2会谈发表公告,公开将台湾列为两国共同保卫的战略目标;2013年4月日台签订《台日渔业协定》等等。这一系列事件是导致中日关系一波三折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只有切实做到如同邓小平所讲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面对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有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可能。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中国政府就要适时做出改善对日关系的姿态。我们看到,自2014年APEC会议中日首脑会谈前达成四点原则共识,2015年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期间中日首脑再次会晤后,中日关系紧张局面有所缓和。同时,中国继续批评日本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展现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第二,坚持发展中日关系对等性,反对日本单方面谋求优势。2010年中国GDP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屈居第三。中国依然遵循邓小平的教导,继续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维护在东海、南海的正当海洋权益,无意也不想挑战既存国际秩序、搞地区霸权主义。再转过来看日本。当中国GDP反超日本,它的急躁、焦虑、不安情绪表露无遗,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让钓鱼岛始终保持一定温度,为日本在国内大肆增加军费、走军事大国化道路寻找合理借口,争当亚洲第一,搞地区霸权主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直露地说,“日益复兴的日本,今后将在亚洲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抗衡中国的实力。希望日本成为这个正在为美国撤退和北京军力增强而担忧的地区的领袖”。“日本为世界‘作贡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在亚洲抗衡中国”。日本想当东亚霸主搞地区霸权主义的心态可谓表露无遗,完全违背了邓小平关于中日两国不要搞霸权主义的忠告。

第三,中国继续做好中日民间外交工作。2015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一部战争法案——新安保法,该法核心解禁集体自卫权,许多日本民众在国会前抗议示威,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日本民众反对国会通过《美日安保法案》以来最大一次抗议行动,这足以说明大多数日本民众是反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也证明当年邓小平将日本广大人民和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将希望寄托于日本人民的思想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中国应该继续做好中日民间外交工作,“以民促官”是中国对日外交思想的精髓之一。当前,两国应该继承这一传统,充分发挥两国友好协会这种民间组织作用,积极推动两国政界、文艺界、科学界、教育界、宗教界、卫生界、体育界乃至工会、青联、妇联等两国各界人士相互访问交流,几倍、几十倍地扩大两国之间的人与人的接触,特别是加强中日两国青年的往来,促进中日关系向正常轨道上发展,真正实现邓小平期待的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下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5]邓小平.邓小平年谱: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张晓予